

人文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与中国气派

——人文话语传统与现代重构

管 宁

摘要:人文科学是以价值理想方式来呈现具有民族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思想文化成果的科学,其话语体系构建,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扮演重要角色。人文科学的学科属性、价值特性和民族特征,决定了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统文化气脉相接、精神相通。中华美学是传统人文学术的重要构成,形成包括概念、范畴、媒体、判断、术语等在内的独特话语体系,并因其以富有生命意识的中国哲学为根基,形成偏重经验形态和直观性、感悟性、经验性特征,使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具有某种诗性。这使传统人文学术充满感性气质与生命思致,与西方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重“逻辑实证”等研究方式判然有别,从而形成自身鲜明的文化标识。面对当代人文科学话语体系存在依赖西方概念及理论、强调量化及逻辑演绎、重理论体系及影响因子等问题,应充分依据人文科学独特价值与功能,深耕本土文化、传承思维模式、更新话语表达,以实现文化主体性与学术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形成和人文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关键词:人文科学;话语体系;传统人文学术;中华美学;自主知识体系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1.005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文科学的发展及其话语体系构建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重大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人文科学担负着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文化使命。如何呼应时代之需、人民之需,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构建当代人文科学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是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的重大时代命题。

人文科学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是以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艺术、价值观、语言等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情感、思想、精神及社会伦理状况,强调对人的关怀与人格修养的提升。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显而易见,与社会学亦存在区别,社会学以人类行为、制度、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公共管理等为研究对象,以逻辑理性、定量分析(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等为研究方法,是伴随现代化发展而形成的现代学科体系,较之人文科学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特点,社会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对疏离与隔膜。

人文科学话语体系是形成中国气派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中国气派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是其核心内涵,同时包括民族独特经济、地理和风俗习惯等诸要素,这些内涵要素所体现出的综合文化气质与精神气象,构成中国气派的主要表征。其中以诗性审美文化为核心的中华美学传统占据重要地位,是形成现代人文科学的重要文化源流,它在形成中国风格、构建中国气派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传统人文学术若从现代学科分类角度看,主要归属人文学科,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在某种意

作者简介:管宁,福建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福州 350025; gyz2001@sina.com)。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6页。

义上,以传统人文学术为基础的现代人文学,在形成自主知识体系上拥有比社会科学更突出的优势,也更有利于增强现代人文学的文化主体性,形成中国气派。

一、人文科学的内涵与特征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既是一个现代学术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建设任务,同时是一个文化主体性建构与文化自信彰显的过程。其中话语体系作为学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它不仅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带”^①,而且是内在地体现学术研究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的独特介质。换句话说,话语体系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旨趣、修辞美学等,不仅关系到民族语言风格问题,还关系到学术文体民族化的价值评判问题,因而具有文化基因的意义,能从更内在、更本质层面体现学术的文化主体性。

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其意义概要说来表现在:一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文化影响持续扩大,成为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对象,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趋势日益明显,我国走近国际舞台中央步伐加快,这需要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话语体系和阐释理论。二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都是立足当代中国本土的伟大实践与创造,其中蕴含的独特和宝贵经验,以及所提出的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以中国话语进行阐释,形成中国理论。三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明创造,充满各种新的挑战 and 不确定性,需要中华文化智慧的支撑,需要以文化赋予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与文明品质,使数智技术发展不被技术理性所裹挟,推动人文精神的复归,以避免“科学的语言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文方面处于极端萎缩的状态”^②,充分发挥人文科学价值引导、人伦规范和社会规约的重要作用。人文科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自身的学科属性、价值特性和民族特征,决定了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统文化脉络相承、气息相通、精神相连,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文化主体性。

1. 人文科学的学科属性。人文科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言的现代学科分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并形成关于对象的普遍规律为旨归,主要回答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人文科学则探寻人的价值、人类生存意义及其现实问题,并形成和不断塑造某种价值观和价值理想,确立人类行为的价值导向,回答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理念和审美等精神文化层面,而非关于自然、社会的客观认知。人文科学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与民族历史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知识谱系上的密切联系与延续,而且存在文化基因上的深层关联,这决定了其话语体系的构建能够更贴近传统文化,更易于确立文化主体性,并形成自主知识体系。

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畴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创造成果,主要体现在古代经典与古典文论中,并具有与现代人文学不同的文体、话语和研究方式。哲学类主要由论说文、谈话录、笔记等形式呈现;文学艺术类则主要以诗论、文论的形式体现。从研究方法与范式看,历代的学术研究往往以对前代经典的注疏、注释和注解或编撰为主,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见解和思想,形成一种尊崇前贤、注重传承的独特研究方式与创造方式。而现代人文学则是以现代学术论著与论文的形式研究古代美学,如朱光潜、宗白华、叶朗、朱良志、朱志荣等学者的中国美学研究,而钱锺书的古典文化研究则别出蹊径。这种以现代学术论文形式进行的人文科学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以引用和借助西方人文学术概念进行研究;另一种则从中国概念出发进行阐发,形成具有一定古典话语面貌的现代语言风格。从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代诉求出发,后一种方法更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科学话语体系。

^①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② 许钦松编著:《中国山水画对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9页。

中国人文学科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既有人文学术注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一般特点,又有侧重感性直觉和生命体验的特殊基因。儒释道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是传统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在特定历史情况下融糅三家观点,也形成了一些其他要素的文化。从禅宗来说,“作为思维方式,完全依靠直觉体验,通过自己的内心观照来把握一切,无需客观的理性,也不必遵循一般认识事物的推理和判断程序。因此,禅宗往往不借助经典性的文字,而是运用‘语录’和‘公案’来立象设教”^①。这决定了中国人文学科具有更鲜明的直观性和生命直觉特征,不依靠理性分析和推理判断来认识事物、把握世界,由此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即以诗歌、散文或相类的文体形式进行诠释、阐发,从中生发出新感悟、新观点,其论说话语具有诗性与感性的特点,也形成与之相应的修辞美学。从哲学本源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天(客观自然)原本是合一的,“自然”与“人为”应相通、相类和统一,“只因人为的主观区分才破坏了统一”^②,这即是说人文认知过程应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体来看待,不应有主体和客体之分,也就不需要有理性知识的介入,主要靠直观体验、生命感悟。这一传统之悠久与深厚,必然在深层文化心理上影响现代人文科学,这恰是形成中国特色人文科学的重要基石。

2. 人文科学的价值特性。相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因其探寻的是人生观、历史观、宇宙观以及审美观等形而上的思想观念、艺术审美,遵循的更多是价值原则、审美原则、生命原则,而非工具理性、客观逻辑、科学原则。人文科学借助其所阐释、表达、揭示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伦理精神等,一方面为包括艺术素养、道德品质、人格修为等在内的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价值准则,另一方面为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文明发展提供方向指引。由此来看,人文科学作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而是间接的、假以时日的;不是客观的、实体呈现的,而是主观的、诉诸无形的;不是理性的、可量化的,而是感性的、不易测度的。人文科学由此为人类认识自身、把握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在塑造人性品格、启迪人生智慧、赋能经济发展、引导科技进步、规范社会行为、创造文明形态等方面,起到重要和关键性作用。

人文科学的价值特征,决定了它以人为核心研究对象,以人的生命感受及其存在意义为思考重心,由此形成独特的人文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即便是注重逻辑理性的西方学者,也在人文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直观性而非逻辑性的方法。有学者因此认为:“我们不宜提人文学科的逻辑,而只宜谈人文学科的特性”,“立志建立人文学科逻辑并为之奋斗终生的胡塞尔,其现象学的绝对明证性与绝对无前提性,最终并非基于逻辑,而是基于一种悬置逻辑的本质直观的操作方法”^③。

中国古代人文学术在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方面,更注重对生命现象的感知与体验。朱良志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视天地间的一切都贯穿着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的确,“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心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心灵的创造”,已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而“中国美学也是心灵美学,中国美学强调心灵的创造性”^④。建立在这一充满生命意识的哲学与美学背景中,中华文化不仅融注着生生精神,而且发展出独特的诗性气质。以此为基因密码的中国文化艺术,便是一种强调生命感、心灵感的审美创造。仅仅运用现代学术中广泛使用的逻辑演绎、理性分析,在面对中国艺术时,难以叩开其内核、抵达其精髓、感悟其神妙、触摸其灵魂!为此,中华美学以其拥有的“象本体”和“象思维”基本特征,“让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具有某种诗性,让艺术和审美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⑤。

①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②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14页。

③ 尤西林:《人文学科特性与中国当代人文学术规范》,《文史哲》1995年第6期。

④ 叶朗:《“美在意象”是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⑤ 彭锋:《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5期。

对应于中华美学诗性特征而形成的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不仅具有自身概念体系,而且形成相应的范畴、命题^①,并与相关的判断、术语、语言等构成独立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不仅准确、完整地传承了文化基因,而且在继承与发展中,使既有话语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善,让中华文脉得以生生不息、传承千年。如同有学者指出的,“话语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元素”,还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②,正是依凭这一系统、稳定和完善的的话语体系,中华审美文化的精华才得以代代相传。

3. 人文科学的民族特征。人文科学以人为研究中心,但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关联着某一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学科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的价值问题,总是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本身有关,与一个文明体系的民族主体有关”^③;作为一种“以人的内在精神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④,人文科学及其话语所阐发和揭示的,往往不是一种悬搁于民族之上的普遍性原则,而是从对传统的表象与表层传播、继承,进入传统内在与深层的体悟、把握,是在更深层次对传统人文精神、话语习惯、修辞美学的继承,并形成属于某一民族的独特话语体系与人文精神。

中国人文学术具有自身话语体系与文化叙事风格,不同国家和民族亦是如此,这是由人文科学的属性与价值特性所决定的,这形成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人文价值、人文经典具有民族性特点。如果说科学知识强调客观性、普遍性的话,那么,人文知识总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表达价值理性的人文经典不像表达工具理性的科学知识那样,完全以一种普遍的人类性为知识形态特征,而是以地域性、民族性为基础”^⑤。这种民族性特征,既与人文科学产生于特定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土壤相关,也与人文科学发展呈现为世代传承而非隔代断裂的独特发展规律相关,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则表现为替代式、更新式的发展规律。

正因如此,“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较注意探讨普遍规则不同,人文学科则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紧密相关,它提醒人们注意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性,以及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补”^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民族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并达成一种新的共识:民族性不是某些固定的外在格式、手法、形象,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与气质。表现在人文科学中,就是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一种独特的话语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气质和精神气象的表征,并以这种气质与气象区隔于其他话语体系,彰显出人文话语的多样性和自身独立价值。事实上,人文科学话语体系,天然地与民族文化特质、语言传统、审美旨趣、修辞美学、思维习惯等存在内在关联,是一种更内在、更本质、更深层、更具文化基因性质的文化标识。

不难看出,人文科学不仅具有主观性、感性和非理性特征,而且具有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特点,这使它明显区别于其他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科学概念中的“科学”,有其独特内涵:它是对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言的一种“科学”,但与前二者之“科学”概念,在内涵上显然不同。人文之“科学”,在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上,与前二者相似,如探索文化与艺术发展规律,都是对研究对象演变发展之内在规律的探究和把握;所不同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是以主观的、感性的、非逻辑的方式进行,其结果呈现为一种价值理性与价值理想;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以客观的、理性的、逻辑的方式进行,其结果呈现为一种工具理性与实在呈现。总之,人文科学是以价值理想方式来呈现具有民族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思想文化成果的科学。

① 朱志荣:《论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系统的整合》,《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期。

②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③ 朱汉民:《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国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④ 朱红文、刘桂荣、金梦兰:《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⑤ 朱汉民:《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国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⑥ 朱汉民:《古典学知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建构——当代中国国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二、传统人文的话语特性

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在学科分类上没有明显边界,文史哲不像今天人文科学各学科门类那样泾渭分明,而是不分彼此、互相贯通,尤其在艺术审美领域,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无不浸染其中。而艺术审美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使其流布广泛、深入人心,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代表,甚至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为此,我们将聚焦中华美学来探讨传统人文的话语特性,这亦是缘于:其一,以诗性审美为特征的中华美学,因其与儒释道哲学思想存在深层内在关联,具有诗性与思致相融合的突出特征,在传统人文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二,中华美学以其浓厚的生命意识与独特感悟方式,形成一整套传承有序、蕴涵丰富的独特美学概念体系,不仅成为传统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了传统人文的话语方式,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其三,中华美学具有的印象式、感悟式和即兴式特征,与中华文明重直观和经验的传统知识形态存在深刻联系,并由此成为传统人文特性的重要表征。由是,探究作为传统文化重要构成的中华美学的主要特征,澄明其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架,并与西方文化进行参照,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传统人文学术的本质特征,深切感知中华文化的精气神,从而为构建当代人文科学话语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传统哲学以其富有生命意识的特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使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中华美学对生命体验格外关注,形成具有鲜明的生命意识和心灵感悟特征的美学,由此发展出相应的话语体系、修辞美学。比如,中华美学“重视主体的体验和感悟,重视主体的直觉了悟,如虚静、妙悟、神思、心源、兴会、趣味、滋味等”^①,这些独特概念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已然成为中华美学甚至中华文化最具主体性和标识性特征的话语。此外,从广义角度以及话语具有体现民族文化气质与精神特征的性质看,话语体系还可包括典故、母题和经典题材等元素,它们在体现文化创造的民族性特征方面作用显著。如现代新诗中郭沫若《湘累》、余光中《漂给屈原》对屈原与湘水关系的重新写照,对“夯实新诗诗性书写中国精神的根基”^②起了重要作用;《哪吒之魔童闹海》则以数字技术重塑哪吒这一经典IP,延续和强化了具有鲜明文化标识性的哪吒形象。而运用本土话语对此展开研究,不仅能承接话语传统,而且能形成新颖的论题与话语概念。

中华美学之所以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审美文化,在于其自身完整的话语体系,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而中华文化在整体上具有某种诗性,是由于赋予这种诗性的艺术与美学,其本身是由诗性的语言所建构的,这形成与西方美学的差异:“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③。不仅如此,从整体知识形态看,中国古代包括技术在内的知识体系,均具有经验形态知识的典型特征,并在农耕文明时代“保持了领先地位,因为这更符合这个阶段知识形态的范式”^④。

或许因为偏于经验形态,古代美学批评多以诗歌的文体形式呈现。如《二十四诗品》以文采华赡的四言韵诗形式,阐发深邃独特的诗论见解,从形式到概念(如雄浑、冲淡等)都源于传统诗论话语体系,具有很高的艺术理论和审美价值。由此,“这篇以诗写成的论诗之作,更像是一篇艺术哲学的论作,也可以说是一部古人所写的‘美学概论’”^⑤。譬如,《纤秣》一品以“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等诗句,阐释纤秀秣华之美,形容柔媚、细腻、富丽、润泽的境界;《典雅》一品,以“玉壶买春,赏雨茅屋”“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等诗性语言和意象构建,阐发优雅细腻之美,形容“一种风流潇洒的人格境

① 朱志荣:《论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系统的整合》,《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期。

② 方长安:《新诗对中国精神的书写与传承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③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④ 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⑤ 朱良志:《饮之太和:中国美学名著选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第291页。

界”^①。这一诗论形式,以其所创造的独特风神气格,综括阐发中国诗歌美学传统与重要特征,既是源于传统,也是缘于作者有关诗道不关知识、必由妙悟的认知,由此摒弃了知识性的条分缕析,而代之以感性诗化语言。“这种境界呈现方式,在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艺术发展、美学演进过程中有重要影响。”^②明代徐上瀛《溪山琴况》模仿《二十四诗品》而列二十四况;清代黄钺所著《二十四画品》亦是形式上的一种仿效;而今人则有王世襄提炼明式家具的“十六品”,无不从境界视角立论、阐发,足见《二十四诗品》影响之深远。这种以形象、直观的境界呈现方式进行的审美批评,被朱良志先生称为“境界式批评”,其生动性、可感性与启迪性,不是一般枯燥的理论、刻板的逻辑所能比拟。中国哲学被视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而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中华美学,自然也就贯穿和充满着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

中国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画,不着意视觉形象的描摹,不看重客观事物的叙写,而推崇感性经验的表达,追求生命真性的示现,比起一般的视觉艺术对摹写对象的细致观察与表现,更倾向以意象与意境创造来表达心灵感悟、生命体验。因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画家把绘画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一种逻辑的推演,而是一种智慧的、直面人生的感悟”^③。也正因此,画家不求视觉性、图像性方面的成就与突破,而追求一种深邃的境界,即老子所言“为腹不为目”,“它不给出结论,只呈现一种面貌,显现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足以感动人”。事实上,正是这种态度的背后,蕴藏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的本源性,即“一种基本的、原质的感觉”。这种原质的感觉,应该来源于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画最原本的“修身”精神^④。面对这样一种特质的艺术,审美批评必然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话语方式和修辞美学,也更需要一种内在文化气质上的呼应,而非逻辑理性的毫分缕析!

为此,朱良志先生认为,人文学术研究要有科学性,不能随便谈;还要有人文关怀,“人文学科是对人的价值意义的判断,如果仅仅做概念推演的游戏,必然把美学变成符号的分析,我觉得这个离学术的本意就比较远了”^⑤。为此,朱良志对传统艺术的研究,在方法与话语方式上,表现出与传统艺术精神的内在贯通,如他在论述中国盆景艺术具有的天趣审美理想时,这样表达道:“一盆清供,取来一片山林气象,招来几缕天地清芬。小小的盆盎中,有了自然的‘生香活态’,有了天地的‘生韵生情’,有了生生而有条理的机趣,既尽天‘情’,又显天‘理’。”^⑥这全然是一种排比式的感性化、散文式的笔触,看不到一点逻辑理性,更没有概念的推演,也感觉不到学术论文习见的行文格调。像是鉴赏,实为一种透彻剖判;看似分析,更是一种深度沉浸。但就是这样的话语表达风格,才能体现中国美学批评独有的诗性语言,也才能精准、深刻而富有说服力地阐释中华美学独特的内涵与魅力。

中国古典美学因其拥有自身独特话语体系,形成具有鲜明主体性特征的一系列概念,如气韵、意象、高古、妙悟、神思、古意等。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中最核心的特征是写意,与之相关联的是中国美学所独有的气韵、意象、意境、境界等概念,而写意也因此被视作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性概念。由此观之,中国古典美学话语体系,是一套反映中国自然哲学体系、充满感性体悟、自成一体的语汇。叶朗因此指出,“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⑦。因而,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不是“美”,而是“象”。而与“写意”相关的“意象”概念,被视为人类

① 朱良志:《饮之太和:中国美学名著选讲》,第262—266页。

② 朱良志:《饮之太和:中国美学名著选讲》,第292页。

③ 许钦松编著:《中国山水画对话录》,第49页。

④ 许钦松编著:《中国山水画对话录》,第56页。

⑤ 许钦松编著:《中国山水画对话录》,第74页。

⑥ 朱良志:《天趣:中国盆景艺术的审美理想》,《学海》2009年第4期。

⑦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3页。

审美活动的中心范畴,不但关联着人的生活世界,而且引领人走向更高精神境界^①。

由于“文明的标识可以体现在文明的各个方面,但以艺术体现最为集中、形象和典型”^②,而集中体现于艺术之中的“写意精神”正可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典型标识。在某种意义上,话语方式及其体系是一种隐性、潜在的文明标识,相对于显在的、众所周知和一望可知的标识(如龙图腾、中国结、吉祥如意云纹饰等视觉符号),它是一种隐在的文明标识,是更本质层面体现美学精神,更深层次传递文明基因密码的文明标识。由此也可看出话语体系构建对确立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具有更深沉、更持久、更基本的价值意义。

要充分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还需要在与西方文明的对照中进行,也只有在与西方文明的对照中,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才能被凸显出来。比如,“中国人对中华文明标识的认识,需要借助西方文明作为参照”^③。同样,要深入考察与认识中国传统人文话语体系的独特性,不能将视域局限于自身话语体系,而要在与西方人文学学术话语的参照中,获得更清晰的认知。

人文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决定其话语特征与某一民族的文明特征密切相关。因此,从话语体系赖以存在的文明母体来看,中西文明存在本体论框架的不同,即“东方文明的本体论框架是‘天人合一’或者‘一分为三’,西方文明的本体论框架是‘心物二分’或者‘一分为二’”,这两种不同框架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图景:“东方的世界图景是流动的,西方的世界图景是静止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不同:东方强调直觉,西方强调分析;价值取向不同:西方突出个人主义,东方突出生态主义;审美功能不同:东方追求气韵氤氲,西方追求形式井然”^④。而这种不同,在人文科学领域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西方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通过质疑现有理论提出新问题;中国人文学学术传统中,强调“整体性思维”、感性“经验传承”,通过对前人理论的阐释与感悟,得出新见解。如《二十四诗品》以诗的感性形式来表达深邃思考,既有对前人思想理论的总结,也有对以往一些基础性问题所作的独特阐释。《超诣》中“匪神之灵,匪几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的阐发,“强调摆脱神、灵、几、微等终极价值的追问,没有一个抽象的绝对的精神本体,生命的光源就在生命本身,而不待‘道’的光芒来照耀”。这样的论述,被视为“与禅家‘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观念有密切关系”,其“论述角度和观点在此前诗学中是很少见到的”^⑤。

其次,西方重“逻辑实证”方式,论点清晰明确,论据充分有力,论证严密完整,语言明白精准;话语风格严谨缜密,富有逻辑理性。中国是“体悟”认知方式,形成“体悟”式、随感式甚至即兴式阐发,较少强调严格意义上的论证和逻辑演绎;重直观经验与整体把握,语言风格含蓄,富有情感和思致因素,具有诗性与感悟特点,善用比喻和典故。这显然是由不同的话语体系所导致的。如“写意”作为中国美学独特概念,不同于西方“再现”“表现”“具象”和“抽象”,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意境”,因其所蕴涵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和生命感,均是关乎生命体验与人生智慧的感悟与表达,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精神,具有非实体性、不确定性,是一种在变化与灵动中的整体性呈现,难以用严谨的“逻辑实证”方式进行解读与阐释。

再次,西方推崇“问题—方法—结论”的线性结构,强调理论突破与方法论创新,引证规范严格,体现科学精神;中国是多维渐进式结构,表现为起承转合的回旋式理路,侧重基于传统理论的现代阐释与运用,以经典文献互证为主要方法,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趣,并在这个过程中融入智慧观照。例如,童寯在论述其概括的园林三境界——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时,便先以举例方式,在叙述中嵌入评判与观点,阐明何为疏密得宜:拙政园“远香堂北,山池开朗,展高下之姿,兼屏障之势。疏中有

① 叶朗:《“美在意象”是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 彭锋:《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5期。

③ 彭锋:《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5期。

④ 彭锋:《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5期。

⑤ 朱良志:《饮之太和:中国美学名著选讲》,第290页。

密,密中有疏,弛张启阖,两得其宜”;阐释何为曲折尽致:“园周及入门处,回廊曲桥,紧而不挤”,“布置疏密,忌排偶而贵活变,此迂回曲折之必不可少也”;进而引陆放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句作为形象之佐证,并借诗意延伸论述“山回路转,竹径通幽,前后掩映,隐现无穷,借景对景,应接不暇,乃不觉而步入第三境”^①,体现出典型的感性化、诗意化风格,构成渐进式的论说结构与回旋式理路。

此外,西方强调结论的可靠性、科学性,中国在注重可靠性的同时,又强调可能性与潜能;西方更重视纯粹理论探讨,中国则更关注现实应用,如经世致用传统。而在人文价值观方面,西方文化价值观突出个人主体性,强调对个体自由的探讨;中国则更多体现群体价值取向和社会整体利益。这些差异的存在,既源自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源于中西方文明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区别,同时还是中西方知识体系类型与知识形态发展进程的差异所致——中国古代经验形态知识处领先地位,西方则是原理形态知识相对发达^②,由此深刻影响了人文科学话语的发展走向。

三、话语更新与现代重构

从上述对人文科学的特征、价值与民族性,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人文学学术话语体系与审美文化特质的概要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构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话语体系,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离不开对艺术审美独特表达方式的体悟和批评方式的认知,这是形成人文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人文科学话语体系的借鉴,也离不开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从现实情况看,人文科学话语体系构建还不尽如人意:一是人文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过多依赖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概念与相关理论,以至于存在“特别崇尚西方理论,似乎只有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研究才是创新研究,一篇文章不引用西方学术大家的言论,似乎就是落伍于时代潮流”^③的现象。二是在学科规范上,强调量化方式、数理模型,偏重逻辑演绎和理性分析,以及各种格式规范与要求,似乎不如此便不是学术研究。三是评价标准上,过于西方化,重理论体系、概念演绎和影响因子,看重文献引用数量等;同时过于注重所谓学术创新,而不看重学术梳理和积累,更多是“依靠取巧的手段,运用一些新理论,或借鉴一些新方法”^④,没有耐心和定力在掌握前人研究状况、消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这一状况的改变,不仅要着力解决学术风气问题,逐步改变西方化倾向,而且要更好认清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和价值特征,确立评价人文科学研究正确观念,更要持续推动人文科学本土化,不断构建人文科学话语体系。

在数字技术时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它在引领产业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显著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作用,成为当代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和时代的宠儿。相对而言,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功能,因其非直观、非现时性、非实体性,以及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等特征,难以与之相较。但这并不影响其存在价值,关键在如何认知。人文科学对引导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具有潜在而重要的作用。同时,“人文科学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历史的实际、历史的变迁、历史的环境,抽象地讲人文科学的价值,是不能真正说明人文科学的价值的”^⑤。而要充分认识和发挥这种价值,就要确立历史意识与历史眼光,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观念与价值引领。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① 童寯:《江南园林志(第二版)(典藏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

② 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③ 贺仲明:《人文学价值标准的重建——以文学研究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 贺仲明:《人文学价值标准的重建——以文学研究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⑤ 李维武:《人文科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

来,不能缺少历史视野。习近平同志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①。

上述是就人文科学的外在价值而言,即具有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人文科学还具有内在价值,即具有提升人格修养、丰富精神世界、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作用^②,“人文科学所指涉、表现和澄明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深邃的文化传统,将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和敏锐的想像力”^③,其终极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外在价值是由内在价值派生而来的,是人的内在修为与价值诉求外化的结果。但这些价值,都必须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才能实现,也必须有适合这些历史和文化条件的话语体系,否则就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价值功能。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对人的内在价值格外重视,在如何进行人格修为、修身和修养等方面拥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中国式心性智慧传统强调个体德行修为具有优先性”^④,并通过相关艺术活动来完成,强调从事绘画、书法、诗歌、词曲等艺术创造活动,不关注其功利性目的,而是将其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人文科学需要不断回顾历史并回归传统”,因为传统“关注的是世上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能“使人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⑤。依托和根植于这样的传统,必然有助于中国人文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使其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智慧、精神气质、思维方式、概念体系和话语风格。

深耕本土文化,致力于创新阐释。人文科学话语体系的构筑,关键在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其前提是要做长期的、细致的基础性工作,即要深入传统内部,从现代意识和时代需求出发,“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⑥,进行创造性阐释,善于将传统人文智慧与精华运用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与话语体系构建。当然,实现本土学术理论的当代创新和构建当代原创学术概念并非易事,这需要“有效引导知识生产者对本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进行充分学理化、时代化阐释”^⑦,如继承《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和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将“天人合一”观念与生态伦理研究结合,形成本土理论框架。

话语风格是深层文化基因密码的体现,对新的理论及其概念的阐述,应注重从内在风神气格上维系传统脉络。中华文化拥有独特话语模式,“传统美学更注重直观感悟、诗意表达、睿智评点和意会体验过程,其话语模式更接近于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语言风格,而现代美学则强调逻辑分析、概念界定、命题分析和理论建构,尤其关注学术用语的精确性、规范性和系统性”^⑧。新的现代学术话语要在传递传统人文与审美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形成新话语、新范式。

传承思维模式,着力现代重构。整体性、感悟性和模糊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如“意境”“境界”美学及其感悟式、互证式研究等,形成特有的话语方式。对此要在发挥传统思维模式优势基础上,汲取和融合西方实证、数据采集方式,形成在思维方式上既有整体性、模糊性的直观特点,又有个体性、确定性的逻辑特征。因此,从研究方法说,应注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实现人文科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整体思维方式下的现代性重构,是一种从外来文化冲击到中西融合的过程。虽然曾经一段时间西方文论话语成为主导,但同时也有坚守传统人文话语的探索——这是一种始于吸收、接纳,进而提炼、

①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61页。

② 欧阳询、胡菊香:《论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张力》,《学术交流》2014年第9期。

③ 朱红文、刘桂荣、金梦兰:《人文科学的合法性及其文化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④ 王一川:《中华视听美学传统的电视艺术新形态》,《中国电视》2024年第6期。

⑤ 叶朗:《“美在意象”是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74页。

⑦ 杨佳乐、胡乐明:《知识生产过程、学术评价变革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1期。

⑧ 简圣宇:《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现代阐释的学理难度及反思》,《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4期。

融合,最后走向重生、创构的过程。在现代性转换中,“可以说是与未来艺术观念、理论产生互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转译、借用和参合、修正等方式,使中国现代艺术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充满了‘中西融合’‘洋为中用’的实践精神与理论色彩”^①。黄宾虹、傅抱石等一批具有深厚文人画功底的艺术大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西洋绘画、摒弃中国画传统的氛围中,依然坚守文人画传统,并结合时代需求,借助在理论话语与实践形态中“化故为新”的尝试,实现了对传统文人艺术精髓的继承与发展。

更新话语表达,体现时代精神。传统人文学术多以诗歌化语言进行理论探讨,其形式不适合当今时代需求,但传统以感悟式、直观性的话语形式所体现出的对研究对象本质的深刻把握与精到概括,不失为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值得很好地继承运用。如朱良志对园林“步移景改”特征的解读,使用了“沉浮于世界气场中”^②这种相对模糊和形象性的话语表达,看似缺乏逻辑性和准确性,却是非常精到而深刻地阐发了“步移景改”的深层意蕴,既生动形象,又贴切新颖。此外,人文科学的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其不论古今,都应将研究对象放置于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展开。钱锺书的人文科学研究,就“总是既从文本自身出发而又超越于文本自身局限,上升到文本所处身其中的文化语境,使文本自身的意义与文本外的文化语境始终处于相互运动又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中”^③。

对待传统文论修辞美学,我们在保留其独特韵味与美感的基础上,应融合现代汉语和现代学术表达习惯,形成新的学术话语风格。术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如对“道”“气韵”等中国概念,既要保留原初语境与意涵,又要建立与西方术语的对话机制。如同有学者指出,“我们需要适度参证西方美学学科的基本范畴,但不能削足适履,更不能求同弃异,不能舍弃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独特贡献。我们阐发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术语、范畴和命题,不是用它们来佐证西方美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在于印证西方美学的普遍价值,而在于揭示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贡献”^④。

中国人文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不只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的过程,还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话语建构不仅要从中汲取滋养,还要从当下实践中提取主题、话题,提炼新概念、创造新话语、形成新范式。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另一方面还要“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⑤。这既是人文科学在实践层面价值实现的需要,也是人文科学自身发展和话语更新完善的需要。比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主题,对文化自信、科技与文化融合、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重大主题,都需要人文科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提炼,形成符合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学术表达与话语体系。

诸多实践经验表明,具有本土特征的话语体系,才能够“有效引导将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生动的本土实践、本土经验、本土方案总结提炼成可编码、易表达的原创学术概念”^⑥,如“小康社会”“中国梦”“人文经济学”“新的文化生命体”等概念的提出,因其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本土话语特征。

不难看出,建构具有标识性、原创性的中国人文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能流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浅尝辄止地继承,而要坚持完整系统地深入探究;不能止于学术理论的自说自话,而要联系实践形成创新思想;不能拘囿于本土视域而画地为牢,而要开拓视野面向世界文明。由此,才能实现文化主体性与学术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构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话语体系,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① 黄宗贤:《在承继中创新——当代美术评论话语体系建构之思》,《中国文艺评论》2024年第12期。

② 朱良志:《中式园林萧散的空间原则》,《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③ 季进:《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④ 朱志荣:《论中国古代美学概念系统的整合》,《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1期。

⑤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⑥ 杨佳乐、胡乐明:《知识生产过程、学术评价变革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1期。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and Cultivating a Chinese Style for the Humanities —The Tradition of Humanistic Discourse and Its Modern Reconstruction

Guan Ning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25, P.R.China)

Abstract: The humanities are disciplines that present cultu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distinctive achievements characterized by national specificity,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achieved through value-oriented idea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discourse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veloping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manner within the domain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humanistic discourse system serves as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shaping the Chinese style. The Chinese style is a multifaceted concept with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t its core, while also encompassing unique economic, geographical, and socio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nation. The resulting comprehensive cultural temperament and spiritual ethos embodied in these traditions constitute its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The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valu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humanities determin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discourse system is aligned with the essence and spiri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humanities, owing to their unique cultural context, possess both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stic scholarship, an emphasis on ideas and values, and a distinctive focus on intuitive percep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Chinese aesthetics form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cholarship, having developed a unique discourse system encompassing concepts, categories, media, judgments, and terminology. Ground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its rich life-consciousness, it has developed characteristics emphasizing experiential forms, as well as intuitive, perceptive, and experiential qualities, endow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an overall poetic qualit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its life-conscious character, profoundly influenced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leading Chinese aesthetics, based on Chinese philosophy,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life experience, forming an aesthetic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life-consciousness and spiritual insight, thereby developing corresponding discourse systems and rhetorical aesthetics. This imbues traditional humanistic scholarship with a focus on sensory qualities and life contemplation, distinguishing it markedly from Western approaches centered 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logical positivism, thus forming its own distinctive cultural identity.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facing the humanistic discourse system, including over-reliance on Western concepts and theories, an excessive emphasis on quantification and logical deduction, and a predominant focus on theoretical systems and impact factors, we should fully leverage the unique values and functions of the humanities by deeply engaging with local culture, preserving distinctive modes of thinking, and renewing discourse expression forms to achiev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academic modernity. Moreover, we must avoid being confined to the introspection of academic theories alone, but should instead link them to practical engagement to forge innovative ideas. Furthermore, we must break free from the confines of narrow local perspectives to embrace global civilizations, thereby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Chinese humanistic knowledge system possessing distinctive and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manifest the Chinese style and demeanor.

Keywords: Humanities; Discourse systems;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hip; Chinese aesthetic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责任编辑:郝云飞]